



喜峰口长城抗战英雄 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的红色绽放

□吴祥

喜峰口长城抗战,自1933年3月9日打响,到4月13日撤出,历时35天。作为当年中国长城抗战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在东西60公里、南北50公里的战场上,以国民革命军第29军为主的中国抗日军民同仇敌忾,浴血鏖战,成为世界战争史上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由此形成的喜峰口长城抗战遗址,更为各方人士千秋凭吊、万人敬仰,2016年和2021年,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为什么喜峰口长城抗战遗址能够获此殊荣?粗浅分析,历史根由大体有三个层面:一是这场战役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全国抗日第一大捷,国民革命军第29军以铮铮铁骨奋起前线,在喜峰口一役杀敌5000多,大大提振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成为决死抗战的一面旗帜。二是29军参加抗战的主要将领,如张自忠、赵登禹等,以喜峰口长城抗战为起点,抗击外敌、奋斗牺牲,成英英烈,始终如一,堪为民族英雄的一面旗帜。三是在喜峰口长城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地方组织以高度的革命自觉,发动人民,积极参战,以此为基点,创立了被毛主席两次称道的冀东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见《毛泽东选集》),树为革命战争堡垒的一面旗帜。

喜峰口长城抗战,在重要历史关头焕发了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凝聚了革命人民的斗志,淬炼了一批成熟的革命军人,他们日后在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地下党组织奋起喜峰 辽沈战役捷足先登

1933年初,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叠加之中,成立于1929年春的中共迁安(含今迁西县)县委表现出大智大勇。据当时中共京东特委1933年2月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称:“京东党与省委失掉关系两年之久,各地方党部工作多限于停滞状态,只有迁安县尚能独立工作。”。中共迁安县委根据当时日寇日益逼近长城各口的实际,遵照1931年“九一八”后党中央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精神,毅然冒着巨大危险,从地下转入公开,及时把县委工作重心由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转移到团结和发动各种爱国力量,共同投入到抗日救亡上来。3月10日,是喜峰口长城抗战刚刚打响的第二天,中共迁

安县委就在驻地(今迁西县韩庄)召开会议,号召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成立了100多人的抗日自卫团,由县委书记军事部长高机先为团长,县委书记韩东征为政委,3月13日就将队伍拉到国民革命军第29军37师驻今迁西县彭庄的222团团部,直接找到团长宁振武商量合作抗日事宜。军方正因缺乏地方配合困难重重,双方马上达成协议,由军方提供自卫团枪支弹药和给养,自卫团为军方提供情报、向导和抢救伤病员,在迁西创造性地率先实现了局部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西安事变后形成的国共合作早4年多。

正是经受过喜峰口长城抗战血与火洗礼的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在县委书记韩东征的带领下,此后12年时间一直在迁西迁安一带坚持抗战。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在蒋介石严令共产党部队原地待命,不得进军受降的情况下,8月11日上午8时,朱总司令从延安发来二号令:“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闻讯后,已经担任迁青平县委书记兼抗日支队政委的韩东征,立即带着500多人的子弟兵从迁西县城出发,冒着倾盆大雨,火速攻破日军盘踞的喜峰口,并迅速冲向承德平泉、辽宁朝阳一线,成为中国关内最早进入东北的军队,为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进军东北、解放东北、领导东北发挥了先锋队的作用。还是这支喜峰口的老部队,日后被编入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立下了白老虎屯攻坚战、锦州机场争夺战、活捉范汉杰白刃战三大战功。毛主席曾经亲笔题词传令嘉奖:“歼敌两万,九纵有份;毁机五架,九纵单干。”由此可以略见,喜峰口长城抗战的红色儿女,在辽沈战役中的不俗表现。难怪参加过喜峰口长城抗战的县委书记韩东征于1949年10月1日,应毛主席特约,作为河北省唯一的农民代表和喜峰口的战斗英雄,登上了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

人民群众扎根喜峰 平津战役再逞英雄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按照原计划,东北野战军要在东北作三个月以上的休整,以厉兵秣马,再战华北。此时,毛主席洞若观火,看到国民党的傅作义华北军事

集团六十万大军,有南撤华东或西撤大西北的趋势,便于11月18日晚6时,对东北野战军下达了紧急命令:以最快速度行军,包围京津唐战略要地。毛主席特意一再嘱咐:为安全保密起见,大军不要走山海关,要走喜峰口。

喜峰口门户洞开,四野大军暗度陈仓,于11月30日夜入喜峰口关。此时,刚成立不久的迁西县委为迎接大军入关,悄悄搬到喜峰口办公,组织民众几天时间将这个一线天式的千古名关,修成了通衢大道,部队一下由四路纵队变成了六路纵队快速推进,在部队通过喜峰口以南迁西60华里的路程中,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数万人昼夜站在公路两厢箪食壶浆,将做好的馒头、小米饭和炒栗子热了又热,双手捧到飞行用餐的战士手中。

经过长城抗战的考验,这里的党和人民已经筑成了一道钢铁长城。

当时迁西全县共13万人口,而参加大军支前的群众达到8.5万人,相当于从10岁到80岁的百姓全部加入了行列。全县人民以“过去舍身舍命参加抗战,现在倾家荡产支援前线”为口号,将长城抗战精神发扬光大。从1948年8月开始,迁西各级党组织未雨绸缪,专门为大军入关建立了8个粮站和8个兵站,每个粮站筹集粮食均超100万斤。为了筹集粮草,迁西境内的滦河主河道上,每天都是千帆竞发;两岸的磨坊,每夜都是灯火通明。要知道,1948年迁西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很多地方颗粒无收,当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仅有1000万斤,平均每人一年不足80斤粮食,到11月的时候,不少人家已经断炊。就是这样,大家仍然把仅有的口粮献了出来保证大军供给,没有一个干部群众动一粒战备军粮。

在喜峰口长城抗战中,当地东营村吴凯素大娘,曾勇救8名将士,被赵登禹认为干娘;此刻又为支援四野大军献出了自家全部粮食,一家人讨饭达一年之久。1951年国庆期间,她作为“子弟兵的母亲”代表,被请上了天安门国庆观礼台。毛主席握着吴凯素的手说:“延安人民用小米、迁西人民用板栗支援了民族解放,我们感谢老区人民!”

革命义士感怀喜峰 淮海战役起义建功

喜峰口长城抗战,不仅有张自忠、赵登禹等以死报国、血染沙场的抗日名将,还

诞生了后来走向光明、临阵起义的何基津将军。

在喜峰口长城抗战期间,何基津是29军37师109旅副旅长,这个旅一直是喜峰口抗战的主战旅。他于1933年3月9日最早率队进入喜峰口的前沿阵地,3月10日旅长赵登禹在老婆山战斗负伤后,何基津更是直接负责一线指挥工作,赫赫有名的500大刀队就出自这个旅,他为喜峰口长城抗战大捷作出了卓越贡献,而升任110旅旅长,后来又在卢沟桥血战中,因表现神勇而升职师长。在喜峰口抗日前线35天的烽火硝烟里,他亲自领略了共产党地方组织不计前嫌、铁血抗战的民族精神,隐隐看到这股力量蕴含的无限生机和光辉前景。1938年2月何基津在大名府抗战时胸部中弹,疗伤期间,经地下党组织牵线,秘密进入延安,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人亲切接见,并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喜峰口抗战、卢沟桥反击、大名府杀敌等情况,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赞扬和不凡礼遇。在延安也同样是35天,让何基津进一步看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和中华民族的前途,积极申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党组织要求,伤愈后返回国民党部队继续带兵抗日。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拉开序幕,按照党中央指示,已经担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总指挥的共产党员何基津、张克侠,一起率领国民党59军全部、77军大部共2.3万人,于11月8日清晨在台儿庄地区发动阵前起义,使国民党百里防线洞开,粟裕部队楔入,切断了黄百韬兵团退回徐州的后路,最终导致王牌军黄百韬第七兵团12万人全军覆没,为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1982年拍摄的红色电影《佩剑将军》故事的真实原型。这次起义,一同跟随何基津在喜峰口长城抗战的老兵仍有100多人,此时都已经升至营级以上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在各自的岗位为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喜峰口长城抗战所形成的红色基因和强大力量,犹如一粒红色的种子,不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开花结果、绽放异彩,而且在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必将不断发扬光大。

(资料图片由作者提供)

铁路货车的变迁

□信宝忠

前段时间我到开滦唐山一号井寻觅中国铁路源头遗址,在唐胥铁路0公里处拍到了一辆20世纪60年代拱板型转向架的木帮敞车,尽管已经锈迹斑斑,却一时勾起几十年前我在货车检车岗位15年的难忘岁月。

1960年代,我国货车主要由30吨、40吨的杂型车组成。那个年代,各国杂型车辆汇集在一块,仅转向架型号就有数十种,令人眼花缭乱。那时候每次车辆实作考试或技术演练,都以30吨杂型车为标准,一共有314个车辆配件、58个限度和标准,每辆车的检查全都用25步检车法完成,不仅要求把每一步应检查的车辆配件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不漏一个车辆配件,而且还要做到名称清楚,步法准确,姿势正确。

到了1980年代初,安全系数大、运用性能高的滚动轴承逐步代替了轴瓦裂损多、事故隐患大的滑动轴承,检车工人开始从笨拙、传统和繁重的工作中得到了解脱。

随着铁路发展的日新月异,车辆载重量和运载能力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载重70吨、80吨的超高新型货车早已取代了载重50吨以下的各种杂型车,成为当前货物运输的主导车辆;一列货物列车的运载量也由过去的近千吨,增加到现在的4500吨至5000吨,尤其是我2011年退休后被返聘唐港铁路公司工作时,亲眼看到迁(安北)曹(妃甸)铁路开行的200辆车组成一大列21000吨重载列车中运用的各种新技术。这种车型在我国铁路货车上首次采用了耐腐蚀性强又延长车辆使用寿命的铝合金及高分子非金属新材料,同时自重很轻载重却达80吨的不锈钢运煤敞车,采用了K6型或K5型转向架,具有运行速度高的特点;车钩缓冲装置采用了可旋转、高强度的车钩,不仅满足了2万吨重载列车编组要求,而且还可适应不摘钩连续翻卸煤炭作业,大大提高了卸车效率。随着新型货车长度日渐增加,检车工人外出检车都要骑着电动车到检车现场。

回顾从20世纪60年代时期30吨杂型车到现在超高重载车走过的历程,印证了在现场手摸眼看锤敲打到微机联网、全程联控的红外线探测车辆轴温自动化的“电子眼”发生的巨大变化,感慨万分,感触极深。50多年来,铁路变化日新月异,货车车种车型越来越丰富,货物载重量越拉越多,货运速度越开越快。而检车工人的劳动强度却越来越轻,工作环境也越来越好。

(图片由作者提供)



和美显春情 春山又文山

——歌曲《上春山》的艺术特色和传播密码

□王雪松

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作为一种和美意象。在龙年央视总台春晚中,一首以春为意象的《上春山》成了大众乐于传唱和演绎的极佳文本,一时间风靡各大媒体平台。该曲源自贵州创作团体,由玉镯儿作词、张超作曲、潘安听编曲。全曲曲调鲜明、结构简洁、朗朗上口,意气风发却文蕴深厚,随处透露着和美春情,又彰显了浓浓诗意,成了极具传播力的成功范本。

共进春光好,和美显春情。在一年的四个季节当中,仿佛只有春天更加易逝,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于是盼春、惜春的情愫在中国传统文韵中便多有显现。歌曲《上春山》亦不例外:“看花人只觉春光太短,与你相约一生春天。”在满满春意中展望春日,不负韶华。在歌曲简洁明快且富有律动的音乐旋律中,展现了携手共进、惜时慕春的青春热情。细观其中,该曲除此情感意象外,还将众

多人间情味融入其中,显现出了一种和合之美。诸如“我上春山约你来见,我攒了一年万千思念”的浓浓友情;“山上儿童那放纸鸢,山下游人纷纷追画船”的闲情童趣等。歌词勾画了众多生动的春日图景,在亿万观众守候的万家灯火中透射出了众多和美意蕴。

春山映文韵,传唱显真情。诗词所具有的意象集聚性往往较易与歌曲创作产生共鸣,并作为歌曲的一种呈示风格与大众独有的审美情趣相契合,甚至在一定历史时期还具有社会教育的功用。如清末民国初期的学堂乐歌《送别》《勉学》《祖国歌》《春游》等歌曲,砥砺青春,爱国自强;再如20世纪上半叶黄自创作的《踏雪寻梅》《玫瑰三愿》,青主的《我住长江头》《大江东去》等曲目也深具意蕴。在当代,“诗词”逐渐演变为古风歌曲的一种独特品格,深受广大喜爱,并且此类歌曲与青少年教育的结合也逐渐成为时尚。品味

歌曲《上春山》仿佛是一部诗词意象的结合体。十四首古诗词文的集体素描,使该曲成了一篇春意诗歌的自画像。从唐代孟郊的《登科后》到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和宋代欧阳修的《踏莎行》再到明朝汤显祖的《牡丹亭》乃至民国时期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等等,集锦了古朴的春日柔情和纷繁春象,不禁慨叹作者的纵古之力和创意运思,该曲也必将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校园群体争相传唱的对象。

作品的传唱不仅需要创意,也需要贴合观众审美习惯和社会需求。《上春山》作为一首清新小曲,摆脱了宏大的情绪勾画和惯用的爱情主题,以向上的青春意象和温暖的氛围渲染,以及浓厚的诗词底蕴完美地捕获了大众的审美需求。此外,歌曲鲜明的“歌谣体”也促生了文本印象的强化。高度模进的旋律走向、传统的五声格调加之极具民族风

的配器手法,以及规整的复现结构,无限扩大了主题旋律在大众脑海的映刻概率。歌词虽富含诗韵,但其以口语化的串联方式和叠置式的构思布局,使词曲紧扣,合力十足,诸此这些共同加持了该曲的传唱。

和美显春情,春山又文山。一首《上春山》撩动了大众心底那份青春的涌动,在惜时共进的和美歌声中给予了人们那份珍贵的静谧和闲适。在巧妙衔接的诗词集锦中,又透露着充满童趣的纯真。《上春山》的传播密码也在于此,这无外乎又激发了大众的审美转向,或许在日后也将会有众多撬动大众审美开关的密码展现在荧屏之上,并借助现代传播的魔力飞入寻常百姓家。

(原载于2024年2月26日《中国艺术报》,本次刊发有改动。作者系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员)